

### 第三轮修改说明

#### 审稿专家 1

修改意见:

送审稿件《主观社会阶层与道德判断的关系：独立型自我构念与零和博弈信念的链式中介作用》(psysci21-058)从阶层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扩展至主观社会阶层，并讨论了主观社会阶层和功利型道德判断之间的中介机制，即独立型自我构念和零和博弈信念，文章对于深挖主观社会阶层和道德判断的深层机制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文章写作相对规范，有一定的条理性与逻辑性。

**回复：**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研究的意义、写作规范和逻辑的肯定。

仍可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包括：

- 1) 文章着眼于主观社会阶层、自我构念、零和博弈信念、道德判断等概念，并致力于了解社会性因素对于道德判断的机制得影响，但是除了变量之间的关系说明外，对于理论价值和实践路径并不清晰，遮掩效应可能存在的其他中介机制会影响主观社会阶层和功利型道德判断，深入内容还待挖掘。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章内容提出的宝贵意见。针对审稿专家提到的问题，已在文章相应部分做出补充修改。对于遮掩效应的解释主要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一是分别解释“主观社会阶层→独立我→零和博弈信念”与“主观社会阶层→零和博弈信念”两条路径的区别。探讨它们之间的区别可以解释为什么控制独立我和不控制独立我时，主观社会阶层对于零和博弈信念的影响不一样，这可能是遮掩效应存在的一个原因，即影响路径不同；二是直接解释为什么加入零和博弈信念之后，主观社会阶层对功利型道德判断的影响削弱。可能的原因是，道德困境都是两难情景，持有零和博弈信念的个体认为世界充满竞争，一方获得就意味着另一方损失，所以面对两难困境时他们更能认同困境情景并将自己代入困境之中，代入之后可能产生更多的共情，从而减少功利型道德判断，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零和博弈信念的遮掩效应。

文稿中对应内容如下：“传统中介效应可以解释“X 对 Y 的影响机制”，而遮掩效应解释的是“X 为何不影响 Y，或 X 对 Y 的影响为何减弱”（温忠麟，叶宝娟，2014）。那么，为什么主观社会阶层对功利型道德判断的正向预测作用会减弱？首先，本研究发现主观社会阶层对零和博弈信念的预测路径有两条，当主观社会阶层通过独立我正向预测零和博弈信念时，独立我具有的“高竞争性”这一特点可能起更大作用。因此主观社会阶层能够通过独立我正向预测零和博弈信念，进而增加个体的功利型道德判断。而在控制独立我之后，主观社会阶层直接通过不同的资源感知负向预测零和博弈信念。有研究表明，低主观社会阶层个体通常具有更多的资源匮乏感（Roux, 2014），而资源匮乏感使个体容易产生更高的零和博弈信念（Różycka-Tran et al., 2015）。因此主观社会阶层可以直接负向预测零和博弈信念，进而减少功利型道德判断。其次，高社会阶层个体对他人痛苦的移情能力减少，在两难困境中做出更多功利型道德判断（Côté, Stéphane, Piff, & Willer, 2013）。遮掩效应的存在可能表明零和博弈信念增加了个体对于两难困境“非此即彼”特点的代入感，增加对他人痛苦的移情，减少功利型道德判断。”（详细请见修改稿件，第 9 页 4.3 部分）。

参考文献：

- 温忠麟, & 叶宝娟. (2014).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005), 731-745.
- Côté, Stéphane, Piff, P. K. , & Willer, R. (2013). For whom do 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 social

class and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3), 490.

Patil, I. (2015). Trait psychopathy and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 the mediating role of action aversion.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27(3), 349-366.

Roux, C. (2014). 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of Resource Scarc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Różycka-Tran, J. , Boski, P. , & Wojciszke, B. (2015). Belief in a zero-sum game as a social axiom: a 37-nation stud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6(4), 525-548.

2) 研究利用问卷星平台在大学生、研究生群中发布问卷，总填写数量为 640 份，最终有效填写数量为 523 份。事实上，对于严格抽样意义而言，缺乏规范的抽样方法，且如果群体是整群抽样，将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主观社会阶层的判断。因此，建议作者后续研究在抽样与样本选择上应该更规范与更科学化。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一定在后续研究中将抽样与样本选择进行更规范与更科学化的处理。已在研究不足部分进行补充：“其次，本研究利用问卷星平台发布问卷，产生的抽样偏差可能会对主观社会阶层产生影响，因此后续研究在抽样与样本选择上应该更加规范。”（详细请见修改稿件，第 9 页 4.4 部分）。

## 审稿专家 2

修改意见： 《主观社会阶层与道德判断的关系：独立型自我构念与零和博弈信念的链式中介作用》一文对社会性因素（主观社会阶层、自我构念与零和博弈信念）影响道德判断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将社会阶层与功利型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推广到主观社会阶层层面上，证明了其中的链式中介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创新意义。作者在文章的多次修改完善过程中对审稿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较充分的补充说明，本研究未来可继续进行与情境相联系的探索，即从不同角度将情境变量设计组合后，与本研究相结合，有可能产生更为丰富的成果。

**回复：**首先，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创新意义及回复态度的肯定。其次，审稿专家提到的未来研究方向非常具有研究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从多种角度来考虑不同情景下，阶层对道德判断产生的影响。已在研究不足部分进行补充：“再次，未来研究应该考虑不同情景下，阶层是如何影响道德判断的。”（详细请见修改稿件，第 9 页 4.4 部分）。

修后再审

提交时间： 2021-06-26 修改稿截止日期: 2021-07-11

审稿专家 1

修改意见:本研究将阶层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了主观社会阶层，并研究了独立自我构念和零和博弈信念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答：非常感谢审稿人对文章创新意义的肯定。

目前论文仍存在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包括：

（1）本研究发放问卷 640 份，最终选取有效问卷 523 份。利用问卷星方法随机发放，但未交代抽样原则和抽样方法，如何规避随意发放中人口变量等相关因素对几个变量的潜在影响。

答：非常感谢专家的认真阅读和宝贵的意见。首先，本研究利用问卷星收集数据，选取的被试并非随意发放，而是在大学生群、研究生群中有偿发放。主要收集在校生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数据，还包括一些已经毕业工作者的数据，被试的情况分布如下表。正文 2.1 被试部分已根据审稿人提出的问题补充了抽样方法：“利用问卷星平台在大学生、研究生群中发布问卷”。

本研究参考前人文献发现，性别和年龄可能会影响道德判断(Friesdorf et al,2015; Capraro & Sippel, 2017; Simon, 2018; Hannikainen et al., 2018)，为了规避问卷发放时人口变量对核心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收集数据被试的时候尽量做到让男女被试数量相匹配，年龄差异尽量缩小（被试的年龄四分位差  $IQR=24-20=4$ ）。并且在数据分析时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了控制。每个研究都不可避免的存在个体差异对因素的影响，在随机收集数据时，保证样本在一些人口学变量上的相对平衡。虽然有研究表明一些反社会人格特质可以预测道德两难困境中的功利判断。比如精神病态特质（Tassy, Deruelle, Mancini et al, 2013）、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生活无意义感知等人格特质同样可以预测个体在道德两难困境中的功利选择（Bartels ,Pizarro, 2011）。但是很少会有个体属于这种极端的人格特质。

职业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大一	55	10.5	10.5	10.5
	大二	78	14.9	14.9	25.4
	大三	71	13.6	13.6	39.0
	大四	71	13.6	13.6	52.6
	研究生及以上	174	33.3	33.3	85.9
	工作2年	56	10.7	10.7	96.6
	工作5年内	11	2.1	2.1	98.7
	工作5年及以上	7	1.3	1.3	100.0
	总计	523	100.0	100.0	

de Bruijne, M., & Wijnant, A. (2013). Comparing survey results obtained via mobile devices and computers: An experiment with a mobile web survey on a heterogeneous group of mobile devices versus a computer-assisted Web survey.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31(4), 482–504.

Mavletova, A. (2013). Data quality in PC and mobile web surveys.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31(6), 725–743.

Peytchev, A., & Hill, C. A. (2010). Experiments in mobile web survey design: Similarities to other

---

modes and unique considerations.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8(3), 319–335.

Tassy S, Deruelle C, Mancini J, et al. (2013). High levels of psychopathic traits alters moral choice but not moral judgment. *Frontiers Human Neuroscience*, 7:1-6.

Bartels DM, Pizarro DA. (2011). The mismeasure of morals: antisocial personality traits predict utilitarian responses to moral dilemmas. *Cognition*, 121(1): 154-161.

(2) 社会阶层包含既相互独立又互相影响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本文选取主观社会阶层, 关于客观社会阶层不做涉及, 因而需要补充为何只选择主观社会阶层的理由。

答: 非常感谢专家的认真阅读和宝贵的意见。本研究的 1.1 部分对于选取主观社会阶层的理由进行了阐述: “研究发现, 主观社会阶层相对于客观社会阶层对一些因变量的预测力更强、更稳定 (Kraus et al., 2013; 胡小勇, 李静, 芦学樟, 郭永玉, 2014; 解晓娜, 李小平, 2018)。例如, 相比于客观社会阶层, 主观社会阶层越高心理压力水平越低, 收入公平感更高等等 (马磊, 刘欣, 2010; Adler et al., 2008; Demakakos et al., 2008; Sakurai et al., 2010)。此外, 主观社会阶层与道德判断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系。首先, 相比于高主观社会阶层, 低主观社会阶层在面对违反纯洁性的行为时, 表现出更加严厉的道德判断 (Horberg et al., 2009)。其次, 高主观社会阶层对他人痛苦移情反应减少 (Piff et al., 2010; Stellar, Manzo, Kraus, & Keltner, 2012), 而移情反应的减少可以正向预测功利型道德判断 (Gleichgerricht & Young, 2013; Wiech et al., 2013; Côté et al., 2013), 因此高主观社会阶层更有可能做出功利型道德判断。”

由于正文的篇幅限制, 在此进行补充论述:

以往很多研究都比较重视客观社会阶层,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 一些研究者对社会阶层客观指标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Goodman et al., 2001; Liu, Ali, Soleck, Hopps, & Pickett Jr, 2004; Oakes & Rossi, 2003), 因为在研究过程中, 会面临一些问题, 即当客观的阶层定位与社会成员的主观感受不一致时, 研究者拟定的阶层“标签”可能就失去了意义。于是, 主观社会阶层的价值就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 (Adler et al., 2008; Piff et al., 2010)。其次, 本研究中选取的被试极大部分是大学生群体, 其个人没有固定的收入, 但是他们有独立的个人能力并结合自己各方面在人群中的状态来评估自己的相对阶层, 相比之下, 主观社会阶层可以更好地反映出他们对自身的定位和认知, 其态度和行为也能更加倾向于根据自己的主观认知进行调整。

#### 参考文献

- Adler, N., Singh-Manoux, A., Schwartz, J., Stewart, J., Matthews, K., & Marmot, M. G. (2008). Social status and health: A comparison of British civil servants in Whitehall-II with European-and African-Americans in CARDIA.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66(5), 1034-1045.
- Goodman, E., Adler, N. E., Kawachi, I., Frazier, A. L., Huang, B., & Colditz, G. A. (2001).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social status: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new indicator. *Pediatrics*, 108(2), e31-e31.
- Liu, W. M., Ali, S. R., Soleck, G., Hopps, J., & Pickett Jr, T. (2004). Using social class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research.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1(1), 3-18.
- Oakes, J. M., & Rossi, P. H. (2003). The measurement of SES in health research: current practice and steps toward a new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6(4), 769-784.
- Piff, P. K., Kraus, M. W., Cote, S., Cheng, B. H., & Keltner, D. (2010). Having less, giving more:

(3) 同理，在互依我和独立我的对应关系中，为何只选择独立我，也建议简单交代理由。

答：非常感谢专家的认真阅读和宝贵的意见。本研究的 1.2 引言部分对于选取独立我为中介变量的理由进行了阐述：首先，“根据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可知，高主观社会阶层认为自己不需要依靠他人来完成社会活动，更加关注自我而忽视周围人的感受，长期以来形成独立我（Kraus et al., 2012; 郭永玉, 2015）。由此可知，主观社会阶层对独立我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其次，“高独立我个体具有更高的追求个人目标实现和自我价值体现的社会动机（史宇鹏, 2018），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个体更倾向于采用竞争的方式与他人进行互动（岑延远, 郑雪, 2005），而竞争行为是高零和博弈信念者的表现之一（Gries, 2005; Różycka-Tran et al., 2015）。因此，独立我可以正向预测零和博弈信念。”

由于篇幅限制，在此进行补充论述：

互依我个体倾向于在关系和群体成员关系的背景下定义自己（Kim & Johnson, 2014）。这种自我观包括社会规范、群体成员和他人意见的心理表征。互依我与适应他人需求和保持和谐的动机有关（Lee et al., 2000; Markus & Kitayama, 1991）。Gardner 等人（1999）的研究发现，具有互依型自我构念的个体在面对两难道德困境时，更多地从他人需要出发，做出道义论的判断。鉴于本研究的结果变量为功利型道德判断，因此选择了独立我作为中介变量。

#### 参考文献

- Kim, J. E. , & Johnson, K. . (2014). Shame or prid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lf-construal on moral judgments concerning fashion counterfeits.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48(7-8), 1431 - 1450.
- Lee, A.Y., Aaker, J.L. and Gardner, W.L. (2000), "The Pleasure and pains of distinct self-construals: the role of interdependence in regulatory foc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8 No. 6, pp. 1122-1134.
- Markus, H.R. and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98 No. 2, pp. 224-253.

---

## 审稿专家 2

**修改意见:**在《主观社会阶层与道德判断的关系：独立型自我构念与零和博弈信念的链式中介作用》修改稿中，作者对审稿人意见“零和博弈信念在主观社会阶层和道德判断中起遮掩作用，遮掩作用如何发生和具体机制如何”，进行了较有实质意义的补充说明，使研究揭示的主要结论之一在解释力方面得到较大提升。同时，作者对审稿人提出的关于被试年龄问题、主观社会阶层数据分布问题、前人研究材料问题、重复搜集数据进行验证等问题进行了可接受的补充解释。

答：非常感谢审稿人对上述几个问题回答的肯定。

**(1)**同时，作者对于“在现实的道德判断过程中，人们是否会抛开自我构念而只启动个人信念？这一路径意义何在？”这一问题尚未作出实质回答；

答：非常感谢专家的认真阅读和宝贵的意见。遮掩路径的现实意义确实有待商榷，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佐证，对于该效应的解释也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疑问在 4.4 研究不足之处已指出：“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对于零和博弈信念的遮掩效应解释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作为支撑”。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本研究的这一发现可能解释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这样一种现象，即不同阶层个体在控制了独立型自我构念的情况下，通过零和信念影响道德判断。审稿人提出的，并将这种对于现实意义的思考补充在了正文 4.3 讨论部分：“最后，本研究发现的遮掩路径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机制——控制独立型自我构念之后，不同阶层可以直接通过零和博弈信念影响道德判断。”。

**(2)**对于“研究材料中采用高冲突的个人道德困境和低冲突的非个人道德困境有何必要性”这一问题的回答仅从“对研究材料的性质进行平衡”这一浅显层面进行了解释，并没有深入了解和解释设计这两种实验材料的实质意义。上述问题仍需进行深入分析思考。

答：非常感谢专家的认真阅读和宝贵的意见。两种材料本身是存在差异的，为了防止两种道德困境在本研究主题下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选取两种道德困境作为研究材料。

在进行道德判断的过程中，个人道德困境涉及更多的情绪过程，非个人道德困境涉及更偏向于认知的过程（Greene et al., 2004）。有研究表明，被试在个人道德两难判断中做出更少的功利判断，在非个人道德两难判断中会做出更多的功利型判断（Greene et al., 2004）。并且以往有研究表明高客观社会阶层只在天桥困境而非电车困境中更多地做出功利型道德判断（Côté, Stéphane, Piff, & Willer, 2013），说明客观社会阶层对于不同类型的道德两难困境的道德判断存在差异。本研究采用两种道德困境是想看一下两种道德困境在本研究背景下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主观社会阶层对两种道德两难困境的功利性道德判断影响机制一致，间接说明主观和客观社会阶层之间存在差异。

## 参考文献

- Côté, Stéphane, Piff, P. K., & Willer, R. (2013). For whom do 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 social class and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3), 490.
- Greene, J. D., Nystrom, L. E., Engell, A. D., Darley, J. M., & Cohen, J. D. (2004). The neural bases of cognitive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moral judgment. *Neuron*, 44(2), 389–400

审稿专家 1

**修改意见：** 本研究将道德判断与主观社会阶层相结合，并研究了独立型自我构建和零和博弈信念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更好的理解阶层和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研究条理较为清晰，书写相对规范。

答：非常感谢审稿人对文章研究条理和书写规范的肯定。

**建议可以进一步提升的地方包括：**

**(1) 主观社会阶层影响功利型道德判断是否为虚假相关，如是否路径为主观社会阶层影响移情，而移情是影响功利型道德判断的主因，因此作者应交代选择独立型自我构建和零和博弈信念为何被认为是最具典型的中介机制。**

答：感谢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根据审稿人的意见做出如下回答。

移情确实经常被当作一些因素影响道德判断的中介机制。例如在 Côté 和 Stéphane 等人 (2013) 的研究中，高客观社会阶层之所以比低客观社会阶层个体在电车困境中更多的做出功利型道德判断，是因为高阶层个体对那些在功利型判断中受到伤害的人缺乏同理心。低主观社会阶层的个体对他人的情绪和行为更加敏感，对互动对象的移情更加准确，更具有同理心；相反，高主观社会阶层对互动对象的移情准确性较差，较少具有同理心 (Kraus et al., 2012)。大量证据表明，移情反应的减少会增加个体道德困境功利反应的可能性 (Gleichgerricht, & Young, 2013; Wiech et al., 2013)。但是因素之间的影响错综复杂，移情只是其中一个中介因素，还存在一些其他的中介变量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探究。

之所以选择独立型自我构念和零和博弈信念，是因为本研究关注主观社会阶层是如何影响道德判断的。当预测变量为主观社会阶层时，我们自然会想到与其有关的理论，即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认知理论中包含很多阶层差异导致的个体差异，不同的社会阶层塑造了不一样的社会认知，进而产生其他的个体差异。这些个体差异体现主要体现在自我(包括自我构念，威胁敏感性)、社会觉知(包括移情，解释风格)等这些因素上面 (Kraus, 2012; 胡小勇等, 2014)。然而，还没有研究探讨与自我有关的变量(比如自我构念)是如何影响主观社会阶层和功利型道德判断之间关系的。

以下是关于为什么选取独立我与零和博弈信念作为中介变量的阐述：在文章第 5 页 181-197 行有较为详细的阐述。

自我构念 (self-construal) 是指个体对自我与他人联系或分离的一系列认知、情感和行为的整合 (Singelis, 1994)。作为一种个体与他人关系的基本认知，独立型自我构念对个体形成与他人利益关系的信念具有重要的影响。高独立我个体具有更高的追求个人目标实现和自我价值体现的社会动机 (史宇鹏, 2018)，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个体更倾向于采用竞争的方式与他人进行互动 (岑延远, 郑雪, 2005)，而竞争行为是高零和博弈信念者的表现之一 (Gries, 2005; Różycka-Tran et al., 2015)。因此，独立我可以正向预测零和博弈信念。

有实证研究表明，人们在面对竞争时更有可能形成资源有限的观念 (Lefcourt, 2014)，进而产生更高的零和博弈信念。不仅如此，还有研究者发现竞争促使个体在追求金钱收益时选择利益最大化策略 (Murphy & Robinson, 2008)。因此，具有高零和博弈信念的个体更有可能权衡利弊，然后做出使利益最大化的功利型判断。在具有高零和博弈信念的个体看来，世界的本质是对立的，他们往往高度关注自己的利益，这种信念不仅更容易让人忽视对他人的伤害，并且还会帮助人们合理化功利行为 (Różycka-Tran et al., 2015; Jiang, Hu, Liu, Sun, & Xue, 2020)。



---

参考文献:

- 胡小勇, 李静, 芦学璋, & 郭永玉. (2014). 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社会认知视角. *心理科学* (06), 1509-1517.
- 史宇鹏. (2018). *自我构念对疼痛共情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
- 岑延远, 郑雪. (2005). 竞争性人格的心理机制分析.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1):150-153.
- Côté, Stéphane, Piff, P. K., & Willer, R. . (2013). For whom do 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 social class and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3), 490.
-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Rheinschmidt, M. L., & Keltner, D. .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3), 546.
- Wiech, K., Kahane, G., Shackel, N., Farias, M., Savulescu, J., & Tracey, I. . (2013). Cold or calculating? reduced activity in the subgenual cingulate cortex reflects decreased emotional aversion to harming in counterintuitive utilitarian judgment. *Cognition*, 126( 3), 364-372.
- Gleichgerrcht, E., & Young, L. (2013). Low levels of empathic concern predict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 *Plos One*, 8(4):e60418. doi:10.1371/ journal.pone.0060418.
- Singelis T M.(1994)."The measurement of independent and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5), 580-591.
- Gries, P. H. (2005).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conflict debate: is a "China threat" 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2), 235-265. doi:10.1177/1354066105052966
- Lefcourt, H. M. (2014). Locus of control: Current trends in theory & research. Psychology Press.
- Różycka-Tran, J., Boski, P., & Wojciszke, B. (2015). Belief in a zero-sum game as a social axiom: a 37-nation stud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6(4), 525-548.
- Murphy, D. S., & Robinson, M. B. . (2008). The maximizer: clarifying merton's theories of anomie and strain.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12(4), 501-521.
- Jiang, Xinying; Hu, Xinyan; Liu, Zhenzhen; Sun, Xiaomin; Xue, Gang. (2020). Greed as an adaptation to anomie: The mediating role of belief in a zero-sum game and the buffering effect of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52(none), 109566.

**(2) 零和博弈信念在主观社会阶层和道德判断中起遮掩作用, 遮掩作用如何发生和具体机制, 说明不清楚。**

答: 感谢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 零和博弈信念在主观社会阶层和道德判断之间的遮掩作用确实探讨的不够清晰。文章在前期做文献综述的时候, 只对链式中介部分进行了分析, 遮掩效应算是一个新发现。以往涉及到遮掩变量的研究对于此类变量的讨论都比较模糊, 其机制确实比较难以阐述清晰。本研究对遮掩变量的阐述进行了补充探讨(补充之后的内容在**第9页312-324行**), 补充之后的内容如下:

“传统中介效应可以解释“X 对 Y 的影响机制”, 而遮掩效应解释的是“X 为何不影响 Y, 或者 X 对 Y 的影响为何减弱”(温忠麟, 叶宝娟, 2014)。本研究遮掩效应关注的重点是, 零和博弈信念做中介时, 为什么主观社会阶层(预测变量)对功利型道德判断(结果变量)的影响减弱? 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 主观社会阶层对零和博弈信念的预测作用有两条路径, 当主观社会阶层通过独立我正向预测零和博弈信念时, “高竞争性”这一特点起到更大的作用, 因此主观社会阶层能够通过独立我正向预测零和博弈信念, 进而增加个体的功利型道德判断。而在控制了独立我之后, 主观社会阶层通过不同的资源感知而负向预测个体



---

的零和博弈信念。有研究表明,低主观社会阶层通常具有更多的资源匮乏感(Roux, 2014),而拥有资源匮乏感的个体容易产生更高的零和博弈信念(Rózycka-Tran et al., 2015)。因此主观社会阶层可以直接负向预测零和博弈信念,进而减少功利型道德判断。另外,根据杜帆和吴玄娜(2017)在研究中对遮掩变量的解释,本研究认为零和博弈信念在主观社会阶层与功利型道德判断起到遮掩作用,也表明主观社会阶层与功利型道德判断之间可能有多个机制同时发生作用。”

最后,审稿人指出的这一点确实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已经在讨论的不足之处中注明。

#### 参考文献:

- 杜帆, & 吴玄娜. (2017). 程序公正、不确定性对公共政策可接受性的影响:情感信任、认知信任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02), 194-200.
- 温忠麟, & 叶宝娟. (2014).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005), 731-745.
- Roux, C. (2014). 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of Resource Scarc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 Rózycka-Tran, J., Boski, P., & Wojciszke, B. (2015). Belief in a zero-sum game as a social axiom: a 37-nation stud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6(4), 525-548.

(3) 已有研究表明,年龄可能影响道德判断,如 Simon (2018) 和 Hannikainen (2018) 等。本研究被试年龄 22 岁,其独立型自我构建、功利型道德判断,甚至零和博弈信念本身可能与年龄存在关联,研究结果如何能证明是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而非年龄这一潜在因素造成的影响。

答:非常感谢审稿人提出的宝贵建议,根据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做出如下回答。

Simon (2018) 和 Hannikainen (2018) 两篇文章研究表明,年轻人和年长者在道德判断上是上存在差异,然而在他们研究中年龄段跨度较大。Simon (2018) 的研究中,只发现年长者(Mage= 55-81 岁)相比于年轻人(Mage= 18-25 岁)更多的做出道义型道德判断。另外, Hannikainen (2018) 研究中发现现代年轻人对功利型道德判断的接受程度更高,可能是因为被试年龄跨度相对来说比较大(年龄四分位差 IQR=37-20=17)。本研究被试的年龄跨度(年龄 IQR=24-20=4)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不足以混淆核心变量对功利型道德判断的影响。

为了排除年龄的影响,在文章第 7 页中 257-259 行指出:“有研究表明,性别和年龄可能会影响道德判断(Friesdorf et al, 2015; Capraro & Sippel, 2017; Simon, 2018; Hannikainen et al., 2018)。为了防止混淆核心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对样本的性别,年龄进行了控制。”本研究将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之后,发现依旧存在中介效应。所以可以排除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由年龄这一潜在因素造成。

#### 参考文献:

- Simon, M. N., Yasmina, O., Constantinos, H., & Bruine, D. B. W. (2018). Age differences in moral judgment: older adults are more deontological than younger adult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8(6), 399-405.
- Hannikainen, I. R., Machery, E., & Cushman, F. A. (2018). Is utilitarian sacrifice becoming more morally permissible? *Cognition*, 170(none), 95-101.

## 审稿专家 2

修改意见:《主观社会阶层与道德判断的关系:独立型自我构念与零和博弈信念的链式中介作用》一文对社会性因素(主观社会阶层、自我构念与零和博弈信念)影响道德判断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将社会阶层与功利型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推广到主观社会阶层层面上,证明了其中的链式中介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创新意义。

答:非常感谢审稿人对文章理论价值和创新意义的肯定。

(1)然而,研究结论“主观社会阶层不仅能够通过独立我正向预测零和博弈信念,进而增加个体的功利型道德判断,还可以直接负向预测零和博弈信念,进而减少做出功利型道德判断”,使得研究关于主观社会阶层和功利型道德判断的结论存在矛盾,且作者提供的相关文献较单薄,可能解释说服力不足。

答:非常感谢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研究根据审稿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讨论,并且进一步引用了相关文献来支持研究发现。相关部分在文章的第9页309-324行中进行了补充,相应参考文献也补充在参考文献处。补充之后的解释如下:

“研究还发现,主观社会阶层可以负向预测零和博弈信念,这与 Różycka-Tran 等人(2015)的研究结果一致。并且零和博弈信念在主观社会阶层对功利型道德判断的影响中单独起到了遮掩作用。

传统中介效应可以解释“X 对 Y 的影响机制”,而遮掩效应解释的是“X 为何不影响 Y,或者 X 对 Y 的影响为何减弱”(温忠麟,叶宝娟,2014)。本研究遮掩效应关注的重点是,零和博弈信念做中介时,为什么主观社会阶层(预测变量)对功利型道德判断(结果变量)的影响减弱?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主观社会阶层对零和博弈信念的预测作用有两条路径,当主观社会阶层通过独立我正向预测零和博弈信念时,“高竞争性”这一特点起到更大的作用,因此主观社会阶层能够通过独立我正向预测零和博弈信念,进而增加个体的功利型道德判断。而在控制了独立我之后,主观社会阶层通过不同的资源感知而负向预测个体的零和博弈信念。有研究表明,低主观社会阶层通常具有更多的资源匮乏感(Roux,2014),而拥有资源匮乏感的个体容易产生更高的零和博弈信念(Różycka-Tran et al.,2015)。因此主观社会阶层可以直接负向预测零和博弈信念,进而减少功利型道德判断。另外,本研究根据杜帆和吴玄娜(2017)在研究中对遮掩变量的解释,本研究认为零和博弈信念在主观社会阶层与功利型道德判断中起到遮掩作用,也表明本研究没有考虑到所有的机制,主观社会阶层与功利型道德判断之间可能有多个机制同时发生作用。”

另外,文章在前期做文献综述的时候,确实只对链式中介部分进行了分析,遮掩效应算是一个新发现。以往涉及到遮掩变量的研究对于此类变量的讨论都比较模糊,其中机制确实比较难以阐述清晰。这一点确实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已经在研究不足中注明。

## 参考文献:

- 杜帆,& 吴玄娜.(2017). 程序公正、不确定性对公共政策可接受性的影响:情感信任、认知信任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02), 194-200.
- Roux, C. (2014). 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of Resource Scarc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 Różycka-Tran, J., Boski, P., & Wojciszke, B. (2015). Belief in a zero-sum game as a social axiom: a 37-nation stud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6(4), 525-548.

---

温忠麟, & 叶宝娟. (2014).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005), 731-745.

(2) 研究所得模型具有明显的数据趋动特点,在现实的道德判断过程中,人们是否会抛开自我构念而只启动个人信念?这一路径意义何在?作者对相关问题仍需更多分析思考。

答:非常感谢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首先,我想明确一下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审稿人的意思,您的问题是否是针对“主观社会阶层-零和博弈信念-功利型道德判断这条含有遮掩变量的路径提出的?其中主观社会阶层会不会抛开自我构念,而直接启动个人信念,进而影响道德判断?造成这样的结果有没有可能是数据驱动导致的而没有实际理论意义?如果这条路径存在的话其意义何在?”再次感谢审稿人提出的这个问题,之前确实没有反思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值得深入思考。

文章在前期做文献综述的时候,确实只对链式中介部分进行的分析,遮掩效应算是一个新发现。根据审稿人提到的这个问题,我查阅相关文献,希望进一步明晰不同主观社会阶层是否会抛开自我构念而只启动零和博弈信念?从广义上来说,自我构念也是一种信念,是指个体对自我与他人联系或分离的一系列认知、情感和行为的整合(Singelis, 1994)。因此自我构念也是一种对自己与他人之间关系的“信念”。零和博弈信念(Belief of Zero-sum Game, BZSG)是一种认为自己与他人的社会利益处于对立关系的信念系统。从两者的含义上来看,都是对于自己与社会他人之间关系的判断,就这一方面来说,由于自我构念和零和博弈信念都属于个人信念,所以在控制了独立型自我构念之后,主观社会阶层具有只通过零和博弈信念预测道德判断的可能性。

(3) 研究中被试的年龄范围在 18.86-25.62 之间,通常处于这一年龄段的人群从收入水平及职业发展阶段来说主要是初级阶段,相应地,被试 10 级阶梯量表的主观社会阶层测量平均数 4.721,标准差 1.535,即主观社会阶层中最高阶层评分为 6.256,表明研究对主观社会阶层的测量结果缺少 6 分以上的高阶层数据,这有可能是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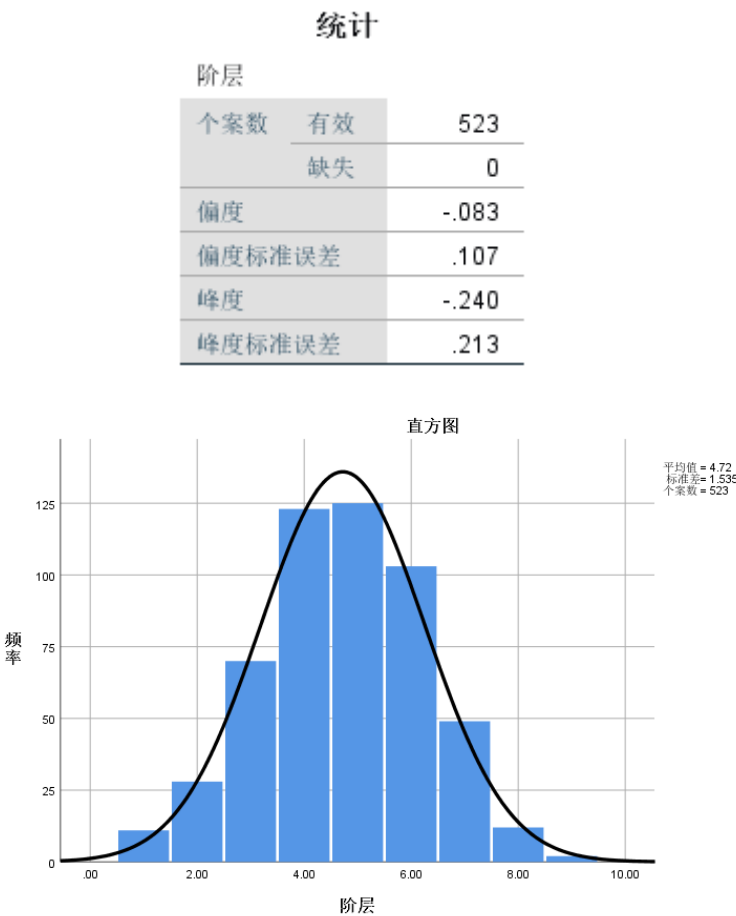
答:非常感谢审稿人提出的宝贵建议,根据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做出如下回答。

首先研究选取这一年龄段的年轻人作为研究对象,其实是想控制年龄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在文章第 7 页中 257-259 行指出——有研究表明,年龄可能会影响道德判断(Simon, 2018; Hannikainen et al., 2018)。Simon (2018) 和 Hannikainen (2018) 两篇文章研究表明,年轻人和年长者在道德判断上存在差异,然而在他们研究中年龄段跨度较大。Simon (2018) 的研究中,只发现年长者(Mage= 55-81 岁)相比于年轻人(Mage= 18-25 岁)更多的做出道义型道德判断。另外, Hannikainen (2018) 研究中发现现代年轻人对功利型道德判断的接受程度更高,可能是因为被试年龄跨度相对来说比较大(年龄四分位差 IQR=37-20=17)。本研究被试的年龄跨度(IQR=24-20=4)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不足以混淆核心变量对功利型道德判断的影响。

其次,此年龄段对应的主观社会阶层评分均值为 4.721,得分偏度接近 0 说明分布比较对称,主观社会阶层的正态分布图如下。并且由于数据在预处理的时候以 3 个标准差为标准进行了异常数据剔除(因为±三个标准差以内的数据已经包含了大部分数据,且三个标准差以外的数据可能包含了一些可能没有认真作答或社会赞许性过高的成分),“剔除得分在三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这一条剔除标准在文章第 5 页“2.1 被试”中列出。所以阶层的最大和最小值在均值上下三个标准差之间,实际得分区间为[1-9]分。

综上所述,年龄段的选取是为了避免年龄跨度过大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主观社会阶层的得分其实包含 1-9 分的数据,分数正态分布,其中包含 6 分以上的较高分数。正如审稿人

所说，也许这样的数据会产生一些问题，但是这种结果是经过权衡之后可以得到的相对比较客观的结果。



主观社会阶层的正态分布图

参考文献：

Simon, M. N. , Yasmina, O., Constantinos, H. , & Bruine, D. B. W. (2018). Age differences in moral judgment: older adults are more deontological than younger adult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8(6), 399-405.

Hannikainen, I. R., Machery, E., & Cushman, F. A. (2018). Is utilitarian sacrifice becoming more morally permissible? *Cognition*, 170(none), 95-101.

（4）研究材料中采用高冲突的个人道德困境和低冲突的非个人道德困境有何必要性作者没有说明，显示作者对前人研究材料设计原理缺乏深入了解，因此没有挖掘可能存在的研究价值。

答：非常感谢审稿人提出的宝贵建议，根据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做出如下回答。

研究采用高冲突个人道德困境和低冲突的非个人道德困境的均分作为衡量功利型道德判断的指标，而选取两种道德困境各半是为了对研究材料的性质进行平衡。研究的重点并不是为了区分两种道德困境的差异，所以在研究中并没有对两者进行区分。

另外，根据审稿人提到的这个问题，研究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分析， 即将两类道德困境进行分离，分别以个人和非个人道德困境作为结果变量做两个链式中介分析，考察两类道德困境得到的结果是否有差异。

低冲突道德困境结果表明：主观社会阶层能预测独立我（ $\beta=.219, t=5.093, p<.001$ ）、零和博弈信念（ $\beta=-.162, t=-3.667, p<.001$ ）、功利型道德判断（ $\beta=.092, t=2.087, p<.05$ ），独立我正向预测零和博弈信念（ $\beta=.151, t=3.409, p<.001$ ），零和博弈信念正向预测功利型道德判断（ $\beta=.217, t=1.136, p<.001$ ）。可以看出，主观社会阶层→零和博弈信念→低冲突功利型道德判断，主观社会阶层→独立我→零和博弈信念→低冲突功利型道德判断这两条中介效应的路径系数显著，根据联合显著性检验可以判断从主观社会阶层到功利型道德判断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具体分析结果见表4和表5。

表4 控制人口学变量后，主观社会阶层和低冲突功利型道德判断的中介效应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i>R</i>	<i>R</i> <sup>2</sup>	<i>F</i>	$\beta$	Bootstrap	Bootstrap	<i>t</i>
						下限	上限	
非个人功利型道德判断 (Y)	性别	0.092	0.008	1.453	-0.007	-0.223	0.192	-0.150
	年龄				0.009	-0.031	0.038	0.191
	主观社会阶层(X)				0.092	0.004	0.139	2.087*
非个人功利型道德判断 (Y)	性别	0.245	0.060	6.537***	0.009	-0.389	2.058	1.340
	年龄				0.025	-0.182	0.225	0.209
	独立我(M1)				0.051	-0.024	0.043	0.561
	零和博弈信念(M2)				0.217	-0.072	0.269	1.136***
	主观社会阶层(X)				0.109	0.139	0.323	4.952*
零和博弈信念(M1)	性别	0.219	0.048	6.493***	-0.046	-0.294	0.089	-1.050
	年龄				-0.110	-0.072	-0.009	-2.509*
	独立我(M1)				0.151	0.117	0.436	3.409***
	主观社会阶层(X)				-0.162	-0.182	-0.055	-3.667***
独立我(M1)	性别	0.240	0.058	10.520***	-0.069	-0.189	0.019	-1.605
	年龄				0.093	0.002	0.036	2.151*
	主观社会阶层(X)				0.219	0.054	0.121	5.093***

注：\* $p<0.05$ ，\*\* $p<0.01$ ，\*\*\* $p<0.001$ ，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

表5 链式中介效应及95%置信区间(N=523)

中介路径	间接效应	SE	[Lower, Upper]
主观社会阶层→零和博弈信念→低冲突功利型道德判断	-0.035	0.013	[-0.064, -0.013]
主观社会阶层→独立我→零和博弈信念→低冲突功利型道德判断	0.007	0.003	[0.002, 0.014]

高冲突道德困境结果表明：主观社会阶层能预测独立我（ $\beta=.219, t=5.093, p<.000$ ）、零和博弈信念（ $\beta=-.162, t=-3.667, p<.000$ ）、高冲突功利型道德判断（ $\beta=.093, t=2.116, p<.05$ ），独立我正向预测零和博弈信念（ $\beta=.151, t=3.409, p<.01$ ），零和博弈信念正向预测功利型道德判断（ $\beta=.269, t=6.216, p<.001$ ）。可以看出，主观社会阶层→零和博弈信念→高冲突功利型道德判断，主观社会阶层→独立我→零和博弈信念→高冲突功利型道德判断这两条中介效应的路径系数显著，根据联合显著性检验可以判断从主观社会阶层到功利型道德判断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具体分析结果见表6和表7。

表6 控制人口学变量后，主观社会阶层和个人功利型道德判断的中介效应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i>R</i>	<i>R</i> <sup>2</sup>	<i>F</i>	$\beta$	Bootstrap	Bootstrap	<i>t</i>
						下限	上限	



高冲突功利型道德判断 (Y)	性别	0.131	0.017	2.978	-0.063	-0.378	0.058	-1.441
	年龄				-0.071	-0.065	0.006	-1.616
	主观社会阶层 (X)				0.093	0.006	0.147	2.116*
高冲突功利型道德判断 (Y)	性别	0.295	0.087	9.809***	-0.049	-0.334	0.089	-1.136
	年龄				-0.046	-0.054	0.016	-1.058
	独立我 (M1)				-0.001	-0.180	0.175	-0.025
	零和博弈信念 (M2)				0.269	0.206	0.397	6.216***
	主观社会阶层 (X)				0.128	0.034	0.176	2.906**
零和博弈信念 (M1)	性别	0.219	0.048	6.493***	-0.0457	-0.294	0.089	-1.050
	年龄				-0.1095	-0.072	-0.009	-2.509*
	独立我 (M1)				0.151	0.117	0.436	3.409**
	主观社会阶层 (X)				-0.162	-0.182	-0.055	-3.667***
独立我 (M1)	性别	0.240	0.058	10.517***	-0.069	-0.189	0.019	-1.605
	年龄				0.093	0.002	0.036	2.151*
	主观社会阶层 (X)				0.219	0.054	0.121	5.093***

注：\* $p<0.05$ , \*\* $p<0.01$ , \*\*\* $p<0.001$ ，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

表 7 链式中介效应及 95%置信区间 (N=523)

中介路径	间接效应	SE	[Lower, Upper]
主观社会阶层→零和博弈信念→高冲突功利型道德判断	-0.044	0.016	[-0.077, -0.017]
主观社会阶层→独立我→零和博弈信念→高冲突功利型道德判断	0.009	0.003	[0.003, 0.0146]

由以上补充分析可知，主观社会阶层通过独立型自我构念和零和博弈信念对两种道德判断的影响比较一致，所以本研究使用高冲突个人道德困境和低冲突非个人道德困境两种道德困境所得均分作为衡量功利型道德判断的指标是可行的。但是由于研究有篇幅限制，所以在正文中并没有加入这一部分补充分析。

(5) 另一方面，主观社会阶层与独立我之间的联系从表面看是互为因果的联系，这意味着整个研究的假定需要有进一步的理论或数据支持。

答：非常感谢审稿人提出的宝贵建议，根据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做出如下回答。

问卷类研究确实无法像实验那样论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靠一些理论或者已有研究进行论证。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没有确定的因果关系，当变量或研究关注的问题改变之后，一项研究中的“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有可能变成另外一项研究的“结果变量和预测变量”。

为了论证主观社会阶层和独立我之间的关系，在研究的第 5 页 186-188 行对主观社会阶层和独立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根据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可知，高主观社会阶层不需要依靠他人来完成社会活动，更加关注自我而忽视周围人的感受，长期以来形成了独立型自我构念 (Kraus et al., 2012; 郭永玉, 2015)。由此可知，主观社会阶层对独立型自我构念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所以主观社会阶层和自我构念之间的关系是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得到的，具有一定理论支撑的预测和被预测关系。

参考文献：

郭永玉, 杨沈龙, 李静, 胡小勇. (2015). 社会阶层心理学视角下的公平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3(08):1299-1311.

Kraus, M. W. , Piff, P. K. , Mendoza-Denton, R. , Rheinschmidt, M. L. , & Keltner, D. .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3), 546.

(6) 本研究在 523 人的较大样本研究中各因素之间相关系数偏低，加之研究数据主要通过问卷星路径获得，数据与相关的分析对于直接获得结论还是弱支持的，假定成立还需要有进一步数据或实验证据现在很多研究者对于这样类型的研究通常用重复搜集数据验证的方式证明研究设计和假设验证的合理性。

答：非常感谢审稿人提出的宝贵建议，根据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做出如下回答。

本研究的相关确实比较弱，虽然相关系数可以反映相关的大小，但是相关是否显著还是需要看相关的显著性。中介效应的相关路径其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显著，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也有一些已经发表出来的研究其相关系数和本研究的系数大小相近（e.g., 刘丹霓 & 李董平, 2017; 宋静静, 李董平, 谷传华, 赵力燕, 鲍振宙, & 王艳辉, 2014; 周仁会, 郭成, 杨满云, & 吴慧敏, 2019; 彭自芳, 傅纳, & 张新杰, 2020）。

另外，审稿人提到可以采用重复验证的方式来证明本研究数据的坚挺性。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来不及重新收集一批数据，所以又做了一个补充分析，即抽出一半的数据（ $N=262$ ）进行相关分析及链式中介分析。抽查结果与全部数据得到的结果一致，即主观社会阶层能预测独立我（ $\beta=.171, t=2.784, p<.05$ ）、零和博弈信念（ $\beta=-.183, t=-3.017, p<.001$ ）、功利型道德判断（ $\beta=.100, t=1.608, p>.05$ ），独立我正向预测零和博弈信念（ $\beta=.291, t= 4.797, p<.001$ ），零和博弈信念正向预测功利型道德判断（ $\beta=.245, t=3.867, p <.001$ ）。并且，主观社会阶层→零和博弈信念→高冲突功利型道德判断，主观社会阶层→独立我→零和博弈信念→高冲突功利型道德判断这两条中介效应的路径系数显著，根据联合显著性检验可以判断从主观社会阶层到功利型道德判断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相关结果见表 8，中介效应见表 9。

这样做应该能起到审稿人所说的重复验证效果，进而进一步证明假设的合理性。

表 8：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N=262$ ）

	<i>M</i>	<i>SD</i>	1	2	3
1 主观社会阶层	4.695	1.523			
2 独立我	4.769	0.627	.153**		
3 零和博弈信念	4.456	1.127	-.131*	.259**	
4 功利型道德判断	3.368	1.096	.097	0.101	.236**

表 9：链式中介效应及 95%置信区间（ $N=262$ ）

中介路径	间接效应	<i>SE</i>	[Lower, Upper]
主观社会阶层→零和博弈信念→功利型道德判断	-0.045	0.021	[-0.093, -0.011]
主观社会阶层→独立我→零和博弈信念→功利型道德判断	0.011	0.006	[0.002, 0.027]

最后，本研究是通过问卷星收集的数据，为了得到较为规范准确的问卷数据，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严格的排查。在文章第 5 页 211-214 行写出了提出数据的标准，“剔除填写不认真（作答时间低于 3 分钟），反应一致性（问卷选项连续一致或有明显规律，如 z 字型），得分在三个标准差之外，认真程度自评 3 分以下的问卷”。电子问卷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便捷的看到被试答题时间。并且有很多已发表的研究都采用问卷星来采集数据（刘笛 & 王海忠, 2017; 魏华, 汪涛, 周宗奎, 冯文婷, & 丁倩, 2016; 李放, 王一博, 邢锦涛, & 郑雪., 2018; 文植, 张笑笑, 赵显. 2019; 杨勇勇, 石文典 & 宋有明. 2018），表明采用问卷星平台收集数据是具有可行性的。



## 参考文献

- 刘笛, & 王海忠. (2017). 基于人性本真性的拟人化广告的负面情绪与态度——愧疚感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报*, 49(001), 128-137.
- 魏华, 汪涛, 周宗奎, 冯文婷, & 丁倩. (2016). 叠音品牌名称对消费者知觉和偏好的影响. *心理学报*, 48(011), 1479-1488.
- 李放, 王一博, 邢锦涛, & 郑雪. (2018). 年轻男同性恋者自我概念清晰性与生命意义的关系及作用机制. *心理科学*, 41(05), 1178-1184.
- 文植, 张笑笑, 赵显. (2019). 关系流动性、拒绝敏感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心理学探新*, 39(02), 179-185.
- 杨勇勇, 石文典, & 宋有明. (2018). 知识治理机制与知识共享敌意的关系:员工关系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41(06), 172-178.
- 刘丹霓, & 李董平. (2017). 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网络成瘾:自我弹性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检验. *心理科学*, (06), 1385-1391.
- 宋静静, 李董平, 谷传华, 赵力燕, 鲍振宙, 王艳辉. (2014). 父母控制与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效应. *心理发展与教育*, 03.303-311.
- 周仁会, 郭成, 杨满云, & 吴慧敏. (2019). 死亡焦虑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链式中介模型及其性别差异.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027(001), 143-147.
- 彭自芳, 傅纳, & 张新杰. (2020). 父母冲突与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关系:教养方式和情绪安全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6(6), 668-676.

(7) 细节方面,“4.1 主观社会阶层对功利型道德判断的”标题没有写完;图 1 中的关键变量既有中文又有英文缩写,应当统一。表现出作者的态度不够严谨。

答:非常感谢审稿人能够细致严谨地指出文章中的细节错误,已对文章相应部分(第 7 页的图 1 和第 8 页的 4.1 标题)做出修改。

- ① 将 4.1 的标题补充为“主观社会阶层对功利型道德判断的影响”。
- ② 第 7 页图 1 修改后的图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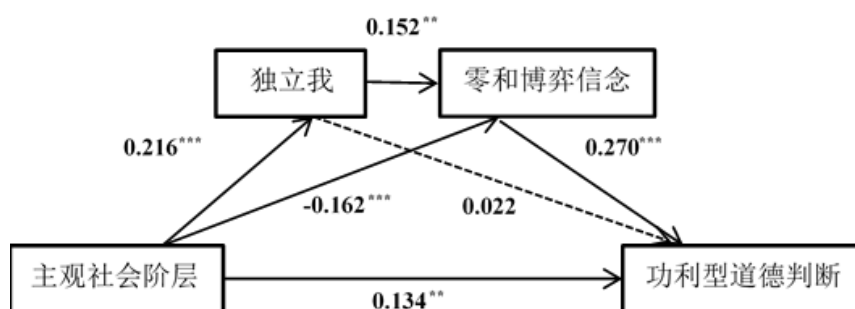


图 1 主观社会阶层对功利型道德判断影响的路径图

修后再审

修改稿截止日期: 2021-03-10